

深切怀念周太玄老师

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 黄明显

记得1952年四川大学生物系为我们两个年级的学生开设了进化论课程，由周太玄老师授课。当时由于全校师生员工都为周老师广博的知识所吸引，所以上课的地方一改再改，最后只好在大礼堂上课，但一千多个座位仍是座无虚席。周老师讲课语气平和，以他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解，如涓涓的细流，浇灌入每位听讲学生的心田。尤其是周老师热心培育青年、谦逊和霭、平易近人的品德和作风，很快得到了全校师生的敬慕。1953年底，任川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周老师调到中央工作离开了我们。

1954年当我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时，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周老师又成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指导老师。他当时身任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任务已够重、够繁忙的了，但为了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为了填补动物学研究的空白，他主动担任了动物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其实周老师为祖国、为党、为人民而勇挑重担的事又何止于此！

青年时代的周老师就曾以诗人，新闻记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等革命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以后勤工俭学到了法国，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吸引，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改学了自然科学。以他那为国为民而努力探索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于1930年获得巴黎大学和法国国家博士的双重博士学位，当时法国一些科研部门都以重金相聘，但他都婉言拒绝了，为了报效祖国，他毅然踏上了归国的途程。1936年，他再次出国，次年回国时带回了大批科技文献资料，为振兴中华从事科学研究作了充分的准备。哪知回国时正值“八一三”事件爆发，所有的书籍和资料全部遗失。科学救国的理想受到严重打击，懊丧、愤怒反而使他精神振作，他回到了故乡成都，担任了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为多难的祖国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尽管身居抗战大后方，周老师也时时焦虑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接受在法国时已有交往的我国伟大老前辈革命家周恩来同志的委托，从事一些利国利民的政治活动。在教学之余，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他又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其科学救国的理想，为中学生文库编写了十多本有关博物学的青少年读物，深受读者欢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周老师更是爱国心切，于解放前夕，突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重封锁，毅然投身革命，接受党的嘱托，到香港任大公报的顾问，并从事统一战线和新闻宣传工作，直到1952年才又回到四川大学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

我有幸作为他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和助手，得到周老师的直接指导和培养，在开展每项科研工作前，周老师要我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制成卡片，他常对我说：从事科研工作要有扎实的基础，要循序渐进。他担任着繁忙的行政工作，又有很多政治活动要参加，但总是按时前来指导研究工作。周老师早年在法国以一种水母为材料，进行了发生学、细胞学和系统进化论的研究，他成功地用中国墨作为染色剂，弄清了一种细胞器——空胞的发生、发育、演化和功能，在细胞生物学研究上有很大的突破，从而获得法国国家博士的头衔和荣誉。回国后学生中都流传着“松滋候”博士的褒称，这时他又以他那当年勇于创新 and 探索的精神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以填补中国腔肠动物学研究的空白，在较短时期内我们就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获得科学院的奖励。1955年周老师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但他仍放心不下科研工作的进行，我们常在病房商讨工作，他一直抱病指导我，总说虽然不能亲自动手，但还可动脑，即使我在野外工作去信向他提出问题，他也总要给予详尽的答复，并随时布置工作任务，以帮助我适应野外情况的变化。研究工作中得出的每项数据，周老师都要仔细审查，发现不足之处，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观察、测试、补充。他经常教导我们，对待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一切都要实事求是，不要怕麻烦，图省事，否则就要坏大事。这些金玉良言，成为指引我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盏长明灯。

在动乱的1968年，周老师被迫含恨离开了人世，他在弥留之际，还告诉守候在身边的师母，要我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要把他珍藏的一套在法国购买的生物学丛书转交给我，然而这部他最珍爱的书却被“造反派”当废纸卖进了纸厂。

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时光易逝，周老师离开我们已整整15个年头，但他那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的一生，时时事事服从党和革命需要的高尚品德，对待科学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和勇于探索的精神，确使我永生难忘，并鼓舞着我为四化努力攀登。